《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第十二期 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研究論文 第45頁 68頁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UMBER 12, Dec. 2004, RESEARCH. pp. 45~68

Desakota與中國新的都市區域的發展*

簡博秀**

Desakota, and New Urban Region in Post-Reform China

by
Titan B. Jian

摘 要

本文試圖從全球化的觀點來重新描繪中國的都市化、城鄉互動和都會區等的研究論述，特別是有關這類研究範型—即Desakota模式，提出一個回顧的討論。本文透過文獻的評析發現，這類型的研究缺乏一個以全球空間的表述方式和新的產業分工來支持和說明中國都市化形成的機制和作用力，其次則透過部分全球主義學者的論述來支持新的研究範型，這包括區域國家和都會區—腹地系統二個空間模式。最後，文中分別透過一個地方性產業聚集的新空間模式，同時來強調以全球城市為中心所形成的一個新的空間結構，做為對中國新的都市區域的一個新的趨勢，而且將會形成與改革開放後所不同的都市與區域空間。

關鍵詞：全球化、 Desakota、都市區域、產業聚集和中國

ABSTRACT

With a view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tried to explor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hina research of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teraction and metropolitan etc., especially a main paradigms-Desakota Model.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is main paradigms ignored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space and new spatial division of industry, from many reviews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es, and failed to explain how the china urbanization do emerge and how its mechanism do trigger? With review of the globalist opinions, then, this paper tried to support the new research of urban region, including region-state model and metropolitan-hind land system. Finally, with depicting a new spatial model- industrial cluster, the conclusion will focus upon a new spatial restructuring that forms a surrounding region based on the concentrating on the Global City-which is emphasized as the key influence to china urban-region, and makes different spatial structure of post-reform china urban and reg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Desakota, Urban Region, industrial cluster and China

民國92年10月4日收稿；93年5月8日第一次修正；93年9月5日第二次修正；93年10月5日第三次修正；民國93年10月9日通過。

* 本文部分的研究成果係接受中華民國國科會「全球化，國家領域再結構和中國的都市與區域發展策略(NSC91-2415-H-305-004)」專案研究之補助，並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在論文進行中所提供的協助，以及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所長周志龍教授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地理系陳金永教授的指導，在此一併誌謝。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都會區的治理：一個理論的回顧”一文，與林育諄先生共同發表於“2002年兩岸四地城市發展論壇”91.11.24浙江杭州：浙江大學。

** 作者現為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候選人，A Doctoral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中國都市化和都市區域的模式

在大多數的研究中都指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都市化現象呈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Zou, 1996; Young and Deng, 1998; Shen, 2000: 459）—都市化的人口從1978年的17.8%提升至1998年的30.4%，成長的比例幾乎是1950年到1978年近30年間（上升6%）的2倍。這個都市人口大量成長的趨勢，一方面是來自於城鄉關係的推拉力量，另一方面則是與國家的政策有關，特別是戶口制度的鬆綁和農村責任制度的推動（Kwok, 1987: 388-9; Kim, 1988: 600; Ma and Fan, 1994: 1628; Han and Wong, 1994: 541）。這使得眾多的鄉村人口進入城市找尋工作的機會，不論是擁有城市戶口的、或是流動人口的，都促使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城市人口大量的成長，形成了一些都市快速擴張或是眾多都市聚集的新的大型都會地區。這些都市聚集的地區—如同Keil（1994）所描述的「全球性的蛙躍發展（global sprawl）」、或是Douglass（2000）所謂的「超大都市區域（mega-urban regions; MURs）」、或是Soja（1992）創造的「超都會區（exopolis）」、或是McGee（1991）所謂的「超都市區域（mega-urban region）」等，無論在人口比例上和經濟成就上，都扮演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後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優勢地位（Kim, 1991; Kwok, 1988; Yan et al, 2002）（註1）。甚至在現今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預料將成為中國重要的成長中心和全球的競爭區域。

這個高度成長的都市化現象，透過西方學者論述的引用和中國學者的實例研究，逐漸形成一個屬於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都市區域研究的主題和氣氛，一方面來自於對都市區域聚集形構的空間結構分析，另一方面則是提出了一個有別於西方都市化特色的中國範型。前者在大多數的大陸學者的研究中，將這些城市密集發展的地區稱做『都市帶』或『都市連綿區』等名詞（周一星，1986，1991；崔功豪、杜國慶，1992；顧朝林等，1999；周一星、曹廣忠，1999；胡序威等，2000；姚士謀等，2001；Zhou，2002），它包涵了一些都市發生的組合和一個連續的空間特性，其中沿海地區的幾個快速發展的都市區域正呈現了這個都市化和都市集中的現象。後者，則透過前者所建構的都市系統和空間結構，新擬一個城鄉互動的觀點，來凸顯中國一個來自於城市底層的自發性都市化類型，並說明來自於社會主義轉型、且有別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空間動力機制，這個廣受許多學者青睞的研究範型，即是所謂的『Desakotasi』（城鄉互動化）研究。

本文試圖從『Desakota』開始，來說明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都市區域研究範型的一個歷史過程，並藉由後續研究者對這個主流範型的補充與評論來說明研究焦點的移轉。儘管這些新的討論包括了近來所強調的新國際勞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NIDL）和個人網絡的制度成本，但本文仍暗示了原有的研究範型—『Desakota』的城鄉互動論述在從企業角色和產業聚集（Industrial cluster）的觀點上是有明顯不足的，而且無法完全反映來自於全球化的空間流動和一個新的都市區域的再結構過程。而這個來自於全球新的和再結構的空間力量，包括了企業的投資和產業的分工和聚集功能，配合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和都市成長而逐漸地明顯與重要，特別是介於區域內都市間的關係。這些優勢的力量不僅發生在跨國空間的重組上，同時也在中國都市區域的空間發展上發生的影響，這使得中國的都市區域的空間呈現不只是改革開放前、或是初期的「都市連綿區」的結果，更重要的在於外資和跨國廠商對地方空間著床的具體表徵，以及由全球城市（global city）所帶動形塑出的新的都市區域空間。因此，新的中國的都市區域發展將呈現一個來自於全球化動力所形塑的結果，而不再只是一味地著墨在一個城鄉關係的協調上。

文章分為六個部分，除了前言以外，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則分別描述了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都市化、城鄉互動和都市區域模式等議題佔有優勢地位的—『Desakota模型』和許多對它的延伸研究與評論，藉此來說明現今中國都市化研究的一個主流範型與它的質疑。第四部分則是聚焦在近年來部分全球主義者對全球化的新的空間描述，藉此來討論其所衍生的都市區域的空間內容，其中特別透過（1）區域國家（region-state）和（2）都會區—腹地系統（metropolitan-hind land system）等兩個研究範型來引證在全球經濟結構下的新的發展模式，做為對後續研究的比較與參考。第五部分則把研究焦點從全球化的角度來辯證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都市化的結構因素，說明其實所謂傳統的Desakota模型所欠缺對全球體系的空間關係和產業分工的分析框架，以致於無法完全捕捉現今中國都市區域的空間形塑和再結構的過程，並透過這個所強調的全球空間體系和產業空間聚集（industrial cluster）的述敘，來強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構在以全球城市為基礎的空間結構與領域，將是未來形塑中國新的都市區域的最主要範型。最後則是結論。

二、Desako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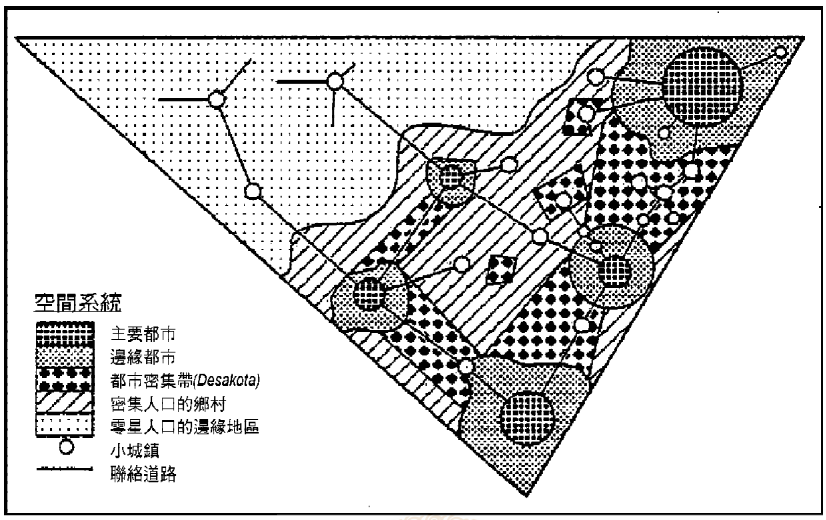
近二十年來，都市區域的發展模式激起了學者對開發中國家和東亞國家研究的興趣，使得部分學者試圖去印證西方理論發展模式的試用性，以及尋求新的範型來驗證開發中國家所代表的特殊形式—而Desakota就是這類型研究的一個重大發現。

首先，Ginsburg（1991: 31-32）比喻了美國都會區發展的空間模式與城鄉間的互動關係，說明了其實在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擴張型都會區並非如此—他以日本為例，指出（1）介於城鄉間的空隙地帶，在美日兩國的發展情形是不同的—在美國是散佈著提供城市所需的蔬菜區，在日本則是聚居著與市中心密切相關的通勤人口；（2）來自於中心向外的擴散力量—在美國是來自於郊區化的住宅需求導向，在日本則是透過工業去中心的結果。如此地論證，強化了Ginsburg和McGee等人對西方理論不適用於亞洲開發中國家的主張，並且認為有

1. 廣泛地接受「城鄉活動的空間分化被視為持續都市化動力」的概念，是過於窄化的想法；
2. 因為被認為有助於都市地區人口集中的“ 聚集經濟 ”和“ 比較利益 ”原則，將都市轉化視為不可避免的過程—這樣的想法是不充份的；
3. 從一個都市化的歷史經驗來描繪都市轉型的西方理論範型，由於它是發生在 19世紀和20世紀初西歐和北美地區的空間現象，並無法可以清楚地轉換給發展中國家在都市化過程中做參考（McGee, 1991: 4-5）。

這些質疑，不僅提出了一個“ 反 ”西方化空間模型適用性的論述，也比較東西方國家在都會區發展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它表示了一個介於亞洲國家和世界體系間不同的互動。為了尋找一個較為符合東方 /開發中國家的範型，McGee和Ginsburg（同前引：6-7）從對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都市區域發展經驗中去仿拓了一個城鄉互動發展的圖騰，來說明一個有別於西方理論、具有開發中國家發展模式的城市空間系統（請參考圖1）。其中，在這個都市區域的空間系統中存在了五種的空間次系統型式—

1. 主要都市：它是藉由一個或二個在都市階層中的超大城市所組成的，並且在地區中內佔有絕對的優勢和領導地位。
2. 邊緣都市區域：這些都市圍繞在主要都市間，且在每日的通勤的距離範圍內。在亞洲的某些地區，這個區域可能自中心城市向外延伸 40公里以上距離的範圍。



資料來源：McGee（1991: 6），本研究轉繪

圖1　Ginsburg-McGee建立的都市區域空間結構模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都市密集帶：也就是Desakota，即所謂的“ 城鄉化 ”。其間混合了密集的農業和非農業活動，通常是延伸在一個介於大城市之間的走廊上。這個區域明顯地包括了密集的農業人口，一般並不排除從事水稻的農業活動。
4. 密集人口的鄉村區域：這個區域發生在亞洲的許多國家，而且特別是對從事水稻的農業活動而言的地區。
5. 零星人口的邊緣地區：在許多亞洲國家中，這個區域通常提供了一個土地租佃的系統，以及不同的農業發展型式。

從這個次系統可知，Desakota其實是一個位於城市與鄉村間的過渡地帶，而 McGee的都市密集區模式顯然與早期Gottman所描述的巨型都市帶（megalopolis）－僅是描述一個都市密集區的現象不同，從 McGee的定義上不難發現－在城市邊緣地帶或是城鄉間的灰色地帶（gray zone），和城鄉間的互動模式在亞洲開發中國家的都市區域間顯得非常重要。特別的是，他強調Desakota不是一個固定的狀況，它是會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而改變的，而都會中心和 Desakota過程（即Desakotasi）在轉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McGee（同前引：14-16）試圖描繪構成這一整個超大都市區域（mega-urban region）的重要面向－（1）一般會有二個以上的大型都市透過交通道路的連結整合在一起；而（2）這個區域包括有：主要的都市、邊緣都市的地區和具有城鄉土地混合使用的密集區沿著道路的發展；（3）在區域內介於二個地點間的交通時間不會超過3-4個小時，甚至有些地區少於這個交通時間；以及（4）在這個地區的鄉村經濟活動是多樣的，而且經濟活動大多依賴在社會網絡上。因此，在這個整體環境描述下，Desakota這個新區域的經濟互動呈現了幾個特殊的外貌：

1. 所有這些地區的最大特徵在於緊密的人口、小型自有耕種的農業和普遍的水稻文化，其中包括了用水的管理和農藝的進行。
2. 在這些米飯文化的影響範圍中，像加爾各答、上海、曼谷和廣州等大都市和都市聚集的地區，同時提供了季節性的勞力，以及稻米和其他產品所需要的重要市場的機會。
3. 這些地區通常具有較好的道路、水運的基本設施，也協助了人口和商品的密集流動。
4. 早在1950年以前，這些地區便是擁有大量便宜勞力的地區，而且期待著國家、國際和私人資本的投入。
5. 這些地區有著高度整合的「交易的環境（transactive environment）」，也就是說擁有人口與商品的聚集流動和網絡組織。
6. 國際勞力分工和全球經濟的擴張在這個地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它們建立了一種情況－藉由准許和鼓勵他們的鄉村勞工投入為國家和國際的工業成長的考量時，國家政府有責任為這個大量且便宜的勞工市場尋求不同的政策。

McGee不只是描述和定義超大都市區域和Desakota而已，他也實驗性地把東亞和南亞國家的都市區域發展做出比較與研究－透過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和城鄉空間轉換的趨勢，他將東亞和南亞開發中國家的都市區域區分為三種類型（見表1的比較）。

延續這些論述，中國學者周一星（Zhou, Y, 1991）的研究焦點則是對McGee的論述提出了在中國都市空間發展上的驗證。他認為 McGee所謂的鄉村都市化－Desakotasi，包括了幾個都會區的彼此的連結和它們所延伸的地區，在中國應該是一個都會連結的區域（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s），並且這些區域應該以都市為基本的組成單位，它們是由許多以大城市為核心且與周邊地區保持相互連繫和緊密社會經濟聯絡的地區範圍。從中國既有的發展模式看來，周歸納了五個都市連綿區發展的條件：（1）由二個或更多超過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所組成的成長極、（2）重要的對外港口、（3）介於成長極間的一個主要的通勤路線和成長極與港口間的一條發展走廊、（4）許多大中小型城市伴隨在這條發展走廊的沿線、和（5）介於城鄉地區間緊密的經濟互動（Zhou, 1991: 98-9）。重要的是，他以實證的觀點認為（1）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遼中南和京津唐地區是幾個中國發展形成的都市連綿區，而（2）山東半島和閩南沿海則有都市連綿區的初步可能的發展機會（同前引：99-109）（請參考圖2）。

在這個實證的分類中，可以明顯地區別中國沿海的四個主要地區在中國的空間和經濟發展中正逐漸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它們正經歷了一個納入及整編在國家經濟體系、區域和都市集合體中的一個過程。另一方面，Ginsburg（1991）從補綴了McGee（1991: 4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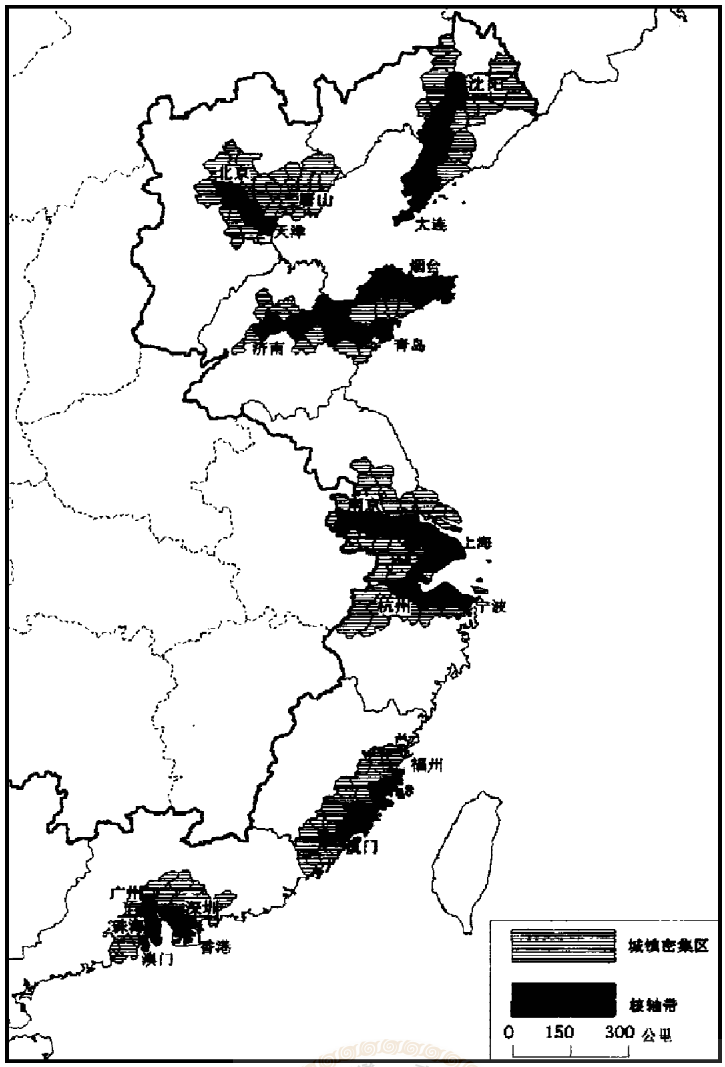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1　McGee對中國及東亞都市區域的研究分類

類　型	特　　徵	地　　區
Type Ⅰ	經歷了一個空間經濟快速轉換的過程，雖然農村仍保留原有的情況，但這空間經濟是人口快速地由鄉村到都市的轉換。	東京和漢城
Type Ⅱ	在過去30年內，這些國家的區域經歷了快速的經濟變化。（農業人口和農產品在全國生產的比例下降，農業朝多元化發展，京津唐地區和遼中南地區）婦女勞力投入工業生產）	沿海四個主要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臺灣
Type Ⅲ	在空間和經濟上類似Type Ⅱ的情況，但是其中的特徵卻是高度的人口成長和偏低的經濟發展。	四川盆地

Type Ⅰ和Type Ⅱ的區位正同樣經歷了國際勞力分工和全球經濟擴張的過程，而且在這些地區中的最大城市和交通節點在這個發展中是非常重要的。

資料來源：整理自McGee (1991: 12-14, 16)。



資料來源：胡序威等人 (2000)

圖2　中國的都市連綿區分布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某些觀點著手—譬如東西方都會區發展的比較，並且更深入地進入了實證的領域。他指出了中國類似、以及未來有可能成為Desakota的地區可能有以廣州、深圳和香港為中心整合的地區（珠江三角洲）、以瀋陽為中心的南滿州地區（遼中南地區）、以北京和天津為首的北部平原（京津唐地區）、和以青島、濟南、西安和長江三角洲中、下游的武漢和重慶為中心的都市地區等。但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則是認為長江三角洲地區，尤其是他引用了Delfs（1987）對這個地區的研究—強調這個稱做「蘇南地區（Sunan area）」所擁有的（1）鄉鎮企業的優越表現，並且憑借著（2）發展完善的交通系統、（3）都市與市場的可及性、來自於（4）高所得的傳統農業所資助下的工業初步發展階段、以及（5）高技術和教育的鄉村勞力，使得這個地區成為具有相當吸引力的城鄉互動的發展地區（引自同前引）。

從對這個研究的範型所做的詳細說明，可知Ginsburg McGee的假設的確為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亞太地區國家，提出一個特有的空間模型架構。它不只是提醒了西方學說在這個地區適用的有限性，而且還提出了他們對這個地區空間發展上的觀察。儘管如此，仍有許多的疑問存在這個假設所談論的實體之中—如（1）對使用這個Desakota模型的概念和路徑應該需要在未來被清楚地澄清，以及（2）有關於模型中聚居轉換過程的機制是否應該有一個更令人滿意的解釋（Lin，2001：386-7）。問題也就是說，一個都市區域是否應該包括一個主要的都市中心呢？或是Desakota只是介於都市中心和都市次中心間的一個過渡地帶呢？或是Desakota的發生只是一個都市對內地影響的空間結構而已？還是說它是由鄉村地區所散發出來的鄉村都市化的一個力量所形成的？

雖然許多問題直指模型中無法解決的一些疑惑，但是就本文的目的而言，這個來自於開發中國家都市區域聚集的空間研究，更似乎不是很充分地說明在一個現今全球化的發展環境下，新的空間趨勢和新的地理選擇將對這些地區有何種的改變？尤其是在新的國際勞力分工的前提下，以及位於世界次邊緣的國家，這些代表競爭區域的空間構成是如何地加強或是弱化新的空間模型的產生？而都市化的發生力量是否仍拘泥在一個以傳統人口中心的空間模式的考量上？或者，空間聚集的元素和空間型態是否仍脫離不了對空間圖騰的模擬而已？因此，接下來本文所要延續的，而且是有系統的，是有關Desakota的研究範型所引起的討論，目的在於強化理論的內容，以及釐清許多理論上的弱點，做為本研究對現行研究範型的一個說明與評論，尤其是近來部分先驗研究已經逐漸地把焦點和空間尺度放置到Desakota所忽略的“全球的（global）”這個空間層級（Lin，1999；2001），以及制度（institution）面的考量上（Marton and McGee，1996）。

三、Desakota與它在中國的辯論

延伸自McGee和Ginsburg的研究模型，許多中國的都市和區域研究的確為改革開放後的都市化、城鄉互動和都市區域發展模式等議題提供了一個有別於西方論述的基本架構，同時激發了中國大多數學者對這類空間研究的興趣，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與看法。以下本文將針對後續學者對Desakota研究的實證分析與描述回顧，並且試圖提出一個近來研究新的討論焦點，做為之後討論全球都市區域發展模式的一個基礎的連結與討論。

首先，許學強等人支持 McGee的論述，認為Desakota有別於西方國家大都會區的定義，而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過程（許學強，1988；許學強和周春山，1994：3-4）（註2）。其次，雖然在城鄉混合的發展上同樣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被證明，但是薛鳳旋和楊春則認為McGee的Desakota論述，在其他幾個面向上是有明顯不同的：（1）該地區非農業活動的增加已超過“同一家庭內各成員的勞動分工為主”和季節性強的特點；（2）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口的流動不限於區內小城鎮往大城市的通勤和區域內的密切的人流和物流，尚且包括區外和省外不斷增加的流動人口；以及（3）珠三角城市密集區的主要動力不在大都市，而在區域內的小城鎮（薛鳳旋和楊春， 1997；1998：291；Sit and Yang，1997）。

從實際的驗證來看，也從形成機制的角度來看，Marton（1993；1995）的一個研究的重心則是放置在對McGee所提出Desakota模式的檢驗。在這個過程中，Marton指出了長江三角洲符合McGee模型的幾個事實特徵：（1）農業生產，是重要的經濟基礎，特別是稻米；（2）上海、南京、無錫和蘇州等中大城市為季節性的勞力提供了機會，又為農產品提供了重要的市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⑶ Desakota模式是以高度的“ 交易環境 ”為特徵，特別是在人、商品和信息的流動方面等，並且認為「城鄉聯繫不僅代表和反映了區域發展的社會和空間現實，而且從農村的角度出發，它也是解釋長江三角洲這樣的地區空間經濟轉變的極重要的因子」。這些重點在於—Marton（1993 ：11）不認為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在發展過程相同—是發生在農村外部的關係、結構和過程等的轉變上，而不是自發性地受到內在動力驅使，然而他卻也強調全球經濟的擴張與國際分工的需要對類似Desakota模式的影響—譬如McGee所描述的（1）著眼於銷售和生產且更熟練管理技術的新勞力分工的出現、（2）大城市逐漸轉換為產業網絡的節點、以及（3）全球與區域性的市場競爭激烈，同時認為這個全球化的衝擊因為長江三角洲內部動力的影響而得到了減緩（Marton，1996 ：276）。

另一方面，在Marton和McGee（1996 ：61-67）持續的研究中，他們找到了影響城鄉互動以及都市區域發展上重要的影響制度因素，尤其在他們對昆山的詳細調查與研究中發現—（1）地方政府和（2）個人在區域經濟發展和城鄉聯繫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前者的重要性在於他們負責與中央關係的協調和對中央履行責任的角色。而這個相互作用是透過個人關係（guanxi）和代表地方利益的高度地方化的行政、制度結構所產生的。正是因為這樣，加上地方官員同時兼任地方企業的利益導向的責任，使得昆山可以利用和操控經濟的結構來發展他們自己累積的資源，同時，昆山和鄉鎮政府則藉由重新詮譯，並且曲解計劃經濟的規則來盲目國家對財政的指導原則，而追求“ 儘可能在一個彈性的方法下對國家的政策充份的利用 ”，以便於使地方受利（註3）。這些角色的背景與論述正說明了昆山地方政府如何可以把自己視為獨立經濟個體的理由，也說明這個個體如何同時地影響到它與區域、國家，甚至是全球的一個方式。後者的影響關鍵在於鄉鎮企業中的地方幹部、職工和各人的專長、經驗與企業經營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來自於這些人的個人社會關係網絡—由於早年上山下鄉的運動，促使原本的上海青年了來到昆山，使得這些人建立與上海之間的緊密連繫，讓這些人扮演了昆山地方發展中的重要角色。另一面，昆山的各級企業也利用所有可能的機會，試圖與鄉鎮外的區域建立技術與管理的聯絡，以促進自己本身發展的進步。其中，這些區域又以上海和之後發展的浦東新區最為緊密。這些透過個人所建構的社會網絡關係，說明了在許多鄉鎮企業仍囿於現狀時，便已有不少作用者（agent）開始意識到與外部聯繫和合作的價值，這使得昆出在90年代初便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地方化的制度體系，用來控制和管理日益繁複與強化的交易環境。

除了上述的共同點外， Marton和McGee（1996）另外又強調了⑶產業縱橫向的聯繫，以及建構這個聯繫最主要作用者—（4）經濟合作委員會，對這個地區都市化驅動的重要影響。所謂縱向與橫向的聯繫，則分別指基於商業利益所形成的跨區和行政界的交流和配置，以及行政目的上地方政府層級間彼此的互動而言。然而這兩個不同內容和目的聯繫，卻藉由這個兼具官方和非官方的機構來達成—經濟合作委員會。當時這個組織的目的是為了提供企業生產資訊和銷售通路而設置，以便於地方企業可以透過一個政府部門的“ 代理組織 ”—經濟合作委員會各級單位，的協調來建立起複雜的交易關係和網絡。實際上，這個組織最主要的工作有兩大類：一是藉由組織專業的交易，加強貨物的交換，以及協調在昆山的鄉鎮企業與外地企業、其他組織間有關經濟和技術的合作；另一是吸收外資和其他不同形式的投資，提升技術和管理的知識。因此，經濟合作委員會也做跨越計劃經濟體制的安排，也就不是來自於縱向連繫的產業合作，在Marton1（1996）所提供的實際例子中發現，經濟委員會甚至可以充當生產合作的中介人，也可以與其他機構共同合作，為爭取地方內企業的利益做出貢獻。這個具有相當彈性，而且落實在地方制度的組織，的確如同Marton所強調的“ 地方因素 ”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個重要的延伸成果來自於 Lin（1999, 2001）的研究。他重新審視McGee等人城鄉互動的觀點，企圖建立一個中國都市區域與全球化對話的空間。他認為人口的遷移在都市區域的發展上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國家的力量對人口的控制政策也潤色不少，尤其是中國擴張的都市區域令人印象深刻的成長，即是藉由國家角色的扮演來達成—一方面讓中心城市關緊大門使得潛在的移民者無法進入，另一方面同時也放鬆對中心城市外鄉村經濟的控制。這樣的模式提起了他對McGee模型的質疑，問題在於：這種類似中國情況的一個政治經濟的過程是否可以建立在其他亞洲城市？如果不可以，那McGee模型對亞洲都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的實用性將可以維持多久？其次，他的研究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擴張都會區做為一個國家和區域發展的「成長發動器(growth generator)」所必要的澄清與說明，因為：一是落實在不同政治經濟中，且介於工業化和都市化間的關係，呈現了一個超過一般所瞭解的複雜性；二是建立在都市轉型和發展研究上的城鄉矛盾的應用模式，需要更有系統的再做評估(2001：401)。Lin(2001)認為這些地區的成長步驟之所以快速於城市中心和區域的邊緣，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地區有(1)高密度的人口、(2)加強的交通設施、(3)國家放鬆的管制和(4)既有存在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s)。

Lin最後所提出的觀點—在強調全球化的論述下領域國家和地方情況的重要性。許多全球化論述的學者都把焦點放置在香港-珠江三角洲地區，並且視這個地區是一個國家終結(the end of nation-state)或是區域國家(region-state)(Ohmae，1995)的舉例的同時，然而，他(2001：402)卻不以為在社會主義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中喪失了治理能力，甚至相反地，儘管有著香港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影響，國家仍有能力去持續地發揮控制對大都市的控制能力；其次，香港和其他國家資本流入這個都市區域，實際上是一個社會關係的地方特殊化的結果，像是介於海外投資者和地方幹部間的血親、個人信用和關係等。Lin的這些論述支持著中國的經驗去對抗一個無邊界世界(a borderless world)觀念的過度簡化和誤導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強調中國的一個特殊性現象所提供做為都會區治理的一個參考。

從Desakota模式所強調的城鄉互動論點著手，Tang和Chung(2000)的研究是更具有理論的批判。他們首先批判Desakota的模式過於低理論化(under-theorization)，而只是一個空間的仿拓而已，尤其對差異甚多的各亞洲國家而言，並非是一體適用的“一般化”解釋。雖然許多中國的先驗研究已經提出了這個城鄉互動的觀念和模式，但他們以在中國所推動的『市帶縣』的新行政體制做為例子，來說明這個新的政策並未能達到促使城鄉互動強化的目的—因為地方化(localization)的空間執行往往超越了全體化(totalization)的約制力量，這是來自於地方權力的過度擴張所導致。而這個來自於過度擴張的權力，一方面使得這些縣級市在它們的行政區界內建立自己利潤的企業，並且和其他行政單位競爭初級原料、投資和資源；另一方面，則禁止資源的流出，以及保護自己當地的市場。於是行政邊界，像是一堵看不見的牆，便成為一個保護城市本身利益的方法。Tang認為市帶縣的體制實際是帶來了一個以縣級城市層級的空間片斷化的新型式，而這個類似細胞結構的片斷化是值得補充Desakota模式在一個地區整合形成上所描述的不足。

從上述許多學者對中國城鄉互動和Desakota模式間的討論，發現了：事實上，包括了周一星、Marton和McGee等學者，許多的研究仍架構在或延續在城鄉互動和城鄉一體化的討論範疇中，而研究的議題也被比較性的突出在中國特色的地方研究(area research)，或是深化的制度和社會機制中。然而，較少的關心被放置在新的全球化為一個都市區域空間結構所帶來的影響因素為何，或是在經濟轉型被忽略的全球經濟勢力的面向到底為何，這使得許多研究中已經透露的或是被低估的線索成為研究中的陷阱。雖然許多說法已經觸及了部分對一個跨越原先緊密閉都市區域範圍的討論，也從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city)和產業空間的再發展來看待這都市區域的治理問題，但對一個全球性都市空間所組成的產業連結、都市區域發展在全球發生中的重要性和對新區域產生的新的再結構因素，卻是較少被論及的。

很明顯的，Lin和Marton的研究構思一樣，同樣以制度面和社會資本的立場來看待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都市化現象，而且更加強了城鄉互動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們試圖把新的勞力分工和全球化的領域概念成為Desakota的一個補充，但是就這個推動空間流動的社會現象的主要來源和動力卻是相當模糊的，尤其對空間的關係和產業活動的提升作用兩者而言，似乎在這些先驗的研究中無法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其中，Laquian(1996：18)很好奇地質疑Marton的研究，認為用來解釋長江三角洲地區都市化基礎的農村工業化過程是否還會持續下去？或是會由上海、或是其他特大都市所釋放的都市化力量所影響？這個解答，其實如同Naughton(1995)已經指出，(偏偏)這些所謂的農業化顯著的地方大多位於大都會區的影響範圍中，如同珠江三角洲鄉村工業的發展與廣州和香港緊密的聯繫，而江蘇和浙江的發展與上海、山東的發展則與北京和天津的都市圈相連等。事實上，中國發展最為快速的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多位於大都會區的範圍中。因此，偏執在城鄉互動的觀點，或是討論一個以鄉村(小城鎮)為基礎的都市化，很清楚地在這個現在全球的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構下是有不足的，而且沒有說服力的。

儘管在蘇南地區擁有強勢的社會網絡在支撐生產和市場網絡的結構，但不可忽略的，而且 Marton也提到的—昆山與上海間的聯絡，是建立在各個都市空間體系間和城鄉發展間的空間關係。這不只是有別於改革開放前自我依賴的都市經濟體系，也反映了改革開放後與國際競爭下的一個產業空間分布。透過這個空間網絡的聯繫，使得區域內超大城市的“ 帶頭作用 ”益加地明顯—藉由城市與城市間，和城市與鄉村間產銷關係的重建與組成，以一個交易環境的基礎上尋找最有利基的比較利益原則，如此提升區域內的生產實力和競爭能力，來架接與全球經濟的市場網絡。如同上述假設所提出的，上海在蘇南地區的角色將愈來愈重要，它不僅要是一個具有全球表徵的世界城市，也要能夠帶動區域內各個城市，以及與鄉村間的產業連繫，更重要的是能夠創造區域內經濟的發達與富裕。

是否應該為中國新的都市區域和都市化的影響因素重新搜尋，或是重新定義？本文從這個研究範型的歷史腳步出發，便是試圖去思考這個新的思考邏輯，並且為中國的新的都市區域研究與發展提出一個方向。值得提出的與引薦的是，從一個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寧越敏（1998）提出了有別於定著於中國傳統研究的重要論點—「當前中國都市化的動力已呈現錯綜複雜的局面，對此有必要從新的角度重新予審視」（註4），所以他提出以城市、企業和個人三方面的角度來討論90年代以後中國都市化動力機制是較為合宜的，並且建構在這三個作用者所交織的都市化將呈現二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從比較利益的原則，資本將會流向比較利益較高的地區，不但個人、企業的投資主要流向沿海地區，而且政府控制的銀行貨款也將流向沿海地區，這便是沿海地區都市化遠過內地所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都市化的過程中的作用力將更為突出，一來地方政府將更重視地方經濟發展，二來透過地方行政權力的操作，如基礎建設的投資貸款和土地批租權等，方便「開發區」的建設成為各地鄉鎮經濟增長的新成長點，正是因為「開發區」的設置減少了跨國公司的交易成本，吸引了國外商的投資，使得地方政府積極地參與經濟過程，促成了地方城市的發展，刺激了中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出現了都市連綿區的雛型。

建構在這個概念下，其實類似的討論在對珠江三角洲的研究中便已被提及—即是所謂的「前店後廠」模式（郭彥弘,1997;Sit,1996;Sit and Yang,1997）（請參考圖3）—即以香港負責銷售與營業，廣東負責生產的跨國生產體系。這個模式成功地利用大陸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提高了香港出口加工業的競爭優勢，並且在香港政府增加公共投資的同時，更加強了與大陸的依存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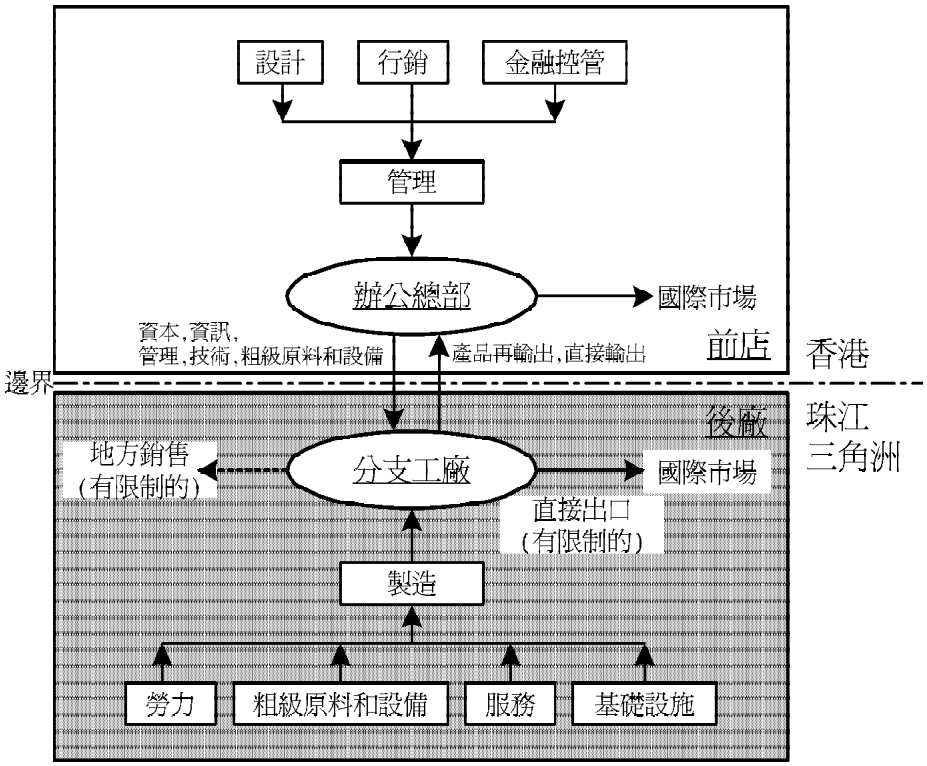
在這個模式中的空間勞力分工是極為明顯的：在香港進行銷售、設計和管理，在大陸進行生產與組裝，而香港提供資本、技術、機器設備和管理，大陸則提供勞力和土地。在香港與大陸共生關係的過程中，香港這個世界都市發揮了許多的作用：⑴香港刺激了大陸混合經濟的發展、⑵香港對大陸的投資不僅引入了新的金融資本，而且帶來了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⑶香港成為大陸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力量、⑷香港促進大陸的經濟由封閉轉變為開放、⑸香港成為華南地區城市體系的中心城市、⑹香港對大陸的發展發揮了對作為臺灣、大陸和東南亞貿易中介橋樑的一個間接且重要的角色（郭彥弘，1997：4）。這個都市區域的操作模式，除了著重在對區域內的產業分工的現象，也把人際間的關係和社會資本放置在空間互動模式的考量，並且使得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詮釋珠江三角洲都市空間體系的變革和層級的變化，這不僅說明在一個全球化架構下空間的真正影響，也印證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一個空間新格局。

因此，本文的重點將建構在這個背景架構下來討論，一是全球化的基本架構，二是在這個架構下對都市區域發展模式的影響，這將有助於釐清中國現今都市化、城鄉互動和都市區域的發展等議題真正的價值。以下則是對現今全球化的空間議題，以及對全球都市區域模式的描繪等論述進行說明，做為之後引證到第伍部分中國實證討論的一個支持。

四、全球化的都市區域模式

全球化持續地影響全球空間的結構，不管是區域的或是都市的，甚至是跨國界的次全球地區的，都不得不受到這個來自於新的自由主義趨勢的影響。實際上，這個全球化的整合過程，如同Held（1991：145）所舉例的，發生在兩個不同的面向：一是政治、經濟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來源：Sit and Yang（1997）。本研究轉繪

圖3　香港—廣東"前店—後廠"的整合模型

社會互動變成更為廣泛的範圍，二是介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和相互連結有一些層級上的強化，以及產生了國家和社會兩者所塑造的國際社會。其中，在這個過程裡有一些明顯的特徵，如(1)金融的全球化和過度生產的權力強化、(2)生產全球化和全球求過於供市場的持續提升、(3)知識的全球化和知識結構與輸出系統的重要性的成長、(4)跨國事業階層的成長和(5)跨國經濟對外策略的提升和國家權力的全球化(Thrift, 1994：366-68)。這使得全球化成為新世紀中影響政治、經濟和社會，甚至是空間，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力量。

透過擁有絕對經濟權力的跨國企業(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的投資與安排，全球的經濟活動於是逐漸地被功能性分配在不同的國家與空間中，加上資訊和交通等科技的創新與進步，構成全球經濟活動的網絡更為廣泛地擴充和強化，使得這些跨國的企業活動可以在利益原則上順利地進行，讓全球各地間的經濟來往和聯繫更為頻繁與容易。因此，新的全球化空間現象不同於以往—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時期。其中的兩個顯著的現象便是—(1)全球的經濟結構，被功能性地整合在一個全球的階層之中；(2)全球網絡因為創新的科技而更為強化，同時地帶動了全球產業和空間的競爭。這時候的全球空間，如同 Harvey(1989)所強調的「時空壓縮」概念，許多原本存在於距離和時間的成本與限制都被裁減與縮短，在全球化的時代完全呈現了一個有別於以往的空間關係與現象。

McGee(1997)指出了兩個全球化的空間現象正在持續地進行：一是在全球和次全球系統中發生了都市化的急速增加和高度連結的都市；二是在次全球階層中發生像歐盟EU和北美自由貿易組織NAFTA等的空間結構，並且逐步地反映在次全球空間的整合過程中。前者，在McGee認為中，將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許多策略性的地點和區位上產生一些大型的首要都市，而且在國家的都市階層中佔有絕對的影響力；後者則是強調了跨國區域間，因為國家疆界的消失而形構了新的空間層級與空間關係。另一方面，Douglass(1992)清楚地指出發生在這些發展背景中的未來 5個空間趨勢：(1)第1個趨勢是指出在國家中的極化發展，這包括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個在區域內和區域周圍的跨國活動的集中化，而且遠離了其他發展較慢的內陸地區。(2) 第2個趨勢是超大都市-區域的發生，將使得新的都市化是由區域基礎的都市化來取代舊有城市基礎的都市化。(3) 第3個趨勢則是世界城市和國際都市階層的鞏固，如同Friedmann (1986，1995) 所指出的紐約和倫敦等世界城市與它們在世界都市體中的地位，而位於第二階的世界城市，大部分在亞太地區，則扮演另一個種程度實質生產、控制等的調節角色。(4) 第4個趨勢是跨邊界區域的形成，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香港—南中國、和圖們江—中國東北—蘇俄黃金三角等地區逐漸地形成新的空間區域。(5) 第5個趨勢則是國際發展走廊的形成，這使得海陸空交通的國際交通網絡，透過有效的通訊與技術連結，讓生產、消費和交易活動被整合在一個實體之中。

從這空間趨勢的描述中可以知道，在這些持續全球化的過程中，都市化扮演了一個決定性、而且是最重要的影響力量。雖然都市化是早發生在資本主義時代的現象，但到全球化時代以後這個現象又更為明顯。在聯合國2000年〈世界人口研究計畫〉的調查與預測中發現—全球都市人口的增加呈現以一年3%的成長比率在進行，這比率遠大於鄉村人口的3倍；而全球的都市人口到了2005年將會到達總人口的一半；到了2025年，這比例則會高達全部人口的2/3比率 (Alden，1996：554-7；Douglass，2000：2315-6；Yeung，2000：1-2)。現在大多數都市的人口都集中在北美和歐洲的城市之中，而且這些地區都市化的比率也遠高於全球平均的、甚至未來所預測的。因此，未來都市化提升的地區將不會出現在這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先進國家，而可預見的是—除了落後的非洲地區以外，擁有眾多人口的亞洲將成為未來都市化活動最激烈的地區，以及全球都市轉型最重要的地區。事實如果真的如此的話，那佔有全球人口60.4%和全球都市人口46.3%的亞洲 (1995) 的確具有未來全球發展上重要的影響力，尤其許多焦點都集中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國 (1995年佔全球30%的人口) 和印度 (27%) 身上 (Yeung，2000：2)。再其次，從這兩者的全球經濟表現上看來，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所面對的國家轉型和空間的變換，是遠遠大於印度這個發展落後的國家的。所以，未來全球都市化的發展焦點將集中在中國的都市表現上以及它所呈現的一個大型都會區的發展空間。

如何去描繪這個全球化後的大型都會區空間？Soja (1992) 創造了一個建議性的名詞『超都會區 (exopolis)』來捕捉具體發生在南加州科技中心的都市化的轉換幾何型式。根據Soja (1992：95) 的描述，超都會區不是沒有一個中心的簡單地一個城市，而是一個在同一時間轉換為“由內到外”和“由外到內”(Soja，1992：95)。然而它可能被貼上了標籤，以都市型式為主的這些結構，在某些觀點發生在一些城市—區域，像是全球性的蛙躍發展 (global sprawl)，如洛杉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法蘭克福—萊茵河、蘇黎士區域、東京-橫濱-名古屋和香港-廣東等其它地區。在這些地區都市化的過程中包含了激進的大量地理性的競爭，而且都市系統形構了新的、也增加的多元幾何的面向，這些增加的多元幾何不僅模糊了都市中心化的傳統模型型式，也同時地透過資本評估它在空間、領域和場所的權利，於是再構成中心—邊陲極化的新的發展模式 (Keil，1994：165)。

以下，本文將引介部分研究學者在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這個前提下，對新的都市區域空間模式研究的成果—這包括了區域國家和都會區-腹地系統的兩個研究範型。這個引介的重點在於，這二個研究的成果建議並提醒了一個新的全球都市區域的發生，以及推動發生的一些關鍵性力量。

(一) 區域國家 (Region-state)

在全球化新的空間形構和生產理論的交織下，大前研一 (Ohmae，1995：80-81) 則提出了一個既大膽又具挑戰性的主張。他認為在全球化的無國界的世界中，原本以為的政治集合體將不具有全球化經濟的影響力，反而是由所謂的『區域國家 (Region-state)』所取代。而這些區域國家都是自然而成的獨立經濟體，即使在地理規模上有限制，但是卻擁有非常龐大的經濟勢力。它可能跨國界，也可能在一個國家的境內，這都純粹是出於偶發的條件下所形成，然而這個邊界的問題是不重要的，因為大前研一認為實際的邊界是由消費者所決定的，而不是每個人必需在特定領域中要對境內政府保持忠誠 (Ohmae，2001)。

在他的構想裡，區域國家的範圍不可能大到使得統轄的公民將無法分享消費者的利益，但也不能太小而小到不符經濟的規模—以服務的觀點來看，便是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通訊、交通、專業服務等可以參與全球經濟所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的規模而言，如至少要在區域內擁有一座國際機場，以及一個具有國際級貨運處理設備的良港等。因此，大前研一預估一個區域的人口數大致是介於五百萬人到二千萬人之間的地區，這個區域的劃分不是由生產力決定的，（如同上述所說的），而是由消費能力、公共建設和專業服務的有效的全球經濟規模來決定。同樣的，在他的研究中舉證了一些實際在全世界逐漸形成的區域國家的例子—如東京和鄰近三個縣所組成的首都區，它們所生產所累積的總值（GDP）在全球排名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德國；另外，包括大阪、神戶和京都的日本關西地區，在全球的生產總值上也僅次於英國，佔有第六位；以及南中國的香港和廣東所形成的新的區域國家等。

因此，在他論述中最主要、也是重要的論點是—區域國家是全世界每個區域和國家進入全球經濟最可靠的門路，也是每個區域國家擁有參與全球化經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許多地區和國家都試圖藉著 4個“ I ”s（Investment、Industry、information、individual）的投入，來驅使這個新的空間模式進入全球經濟的體制中，以謀求在全球化中的最大利益。於是他更強調—區域國家之所以可以成為全球化經濟的敲門磚，是因為區域國家的本質就是因應全球化需求所形成的（Ohmae，1995：80；2001）。

儘管大前在國家終結的論述和消費基礎的概念受到了部分後進者相當多的懷疑和挑戰，但是他所提出的區域國家的概念是相當有信服力的。因為就一個新的空間尺度而言，不論是次全球的和都市區域的尺度，常把它忽略在一個全球化的生產格局和跨國投資的影響下，而他是如此創意地建立一個新的空間層級，並且大膽地描繪這個新層級與全球空間之間的連繫，完全有別傳統理論的限制。即使大前的論述忽略了新的國際勞力在全球空間的再結構模式，以及這些區域內部空間的制度和網絡如何地形構，但僅對公司部門的全球投資和新空間發展的啟發而言，仍是有相當的裨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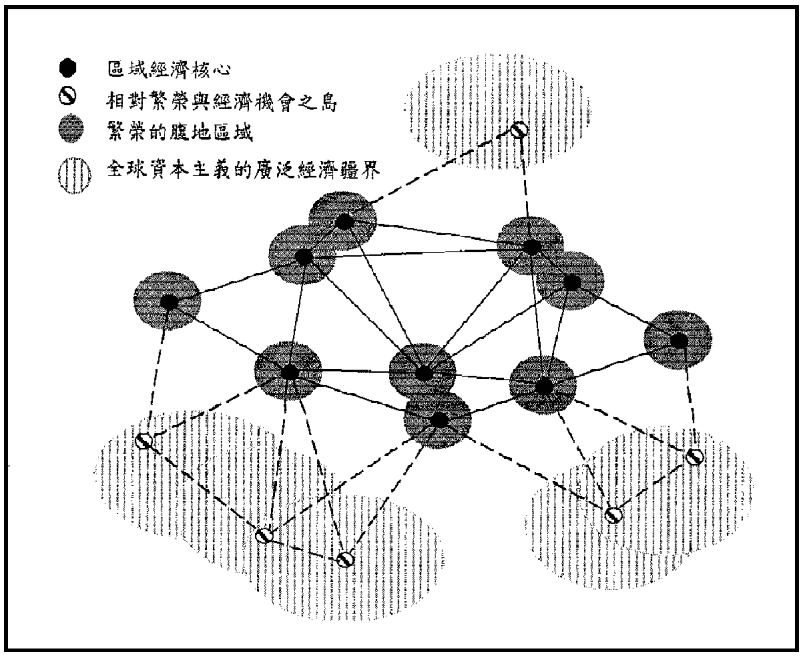
(二) 都會區—腹地系統 (Metropolitan-hind land system)

對一個空間的描述來說，Scott（1996：402）清楚地描繪了全球資本主義落實在一個都市區域的空間型態。他很直覺地感受到未來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將有二個明顯的事實：(1) 整合在一個世界經濟結構的國家資本主義將更為強化，以及 (2) 跟隨前者的超聚集的經濟活動將形構整個系統的基本引擎。下圖 4表達了他對一個都市區域空間的想法，以及他們彼此所形構的關係，這其中必需包涵以下兩個主要的論點（同前引：401-03）：

1. 在圖中，世界已發展地區的表現是透過一個極化的區域經濟引擎所拼湊的。其中每一個地區包括了一個中心的都會區和周圍的腹地所組成。甚至有些「都會區-腹地系統」還彼此相連接，像世界的幾個都會區，如波士頓—紐約—費城、洛杉磯—聖地牙哥—提瓦納、米蘭—圖林—熱那亞和東京—名古屋—大阪等地區。其中，每一個都會區的核心都是經濟活動專業化的網絡基地，它整合了相當多且多樣性的地區性勞工，並且在這每一個系統中都是明顯的聚集經濟、和收益逐漸增加的節點。更重要的，它們的每一個都包括了複雜的全球互動的結構。所以，這些引擎是相當大的，而且未來會成長的更大。
2. 在這個空間下擁有了現今世界極大且空置的擴張環境，而且是位在依賴資本主義極端擴張的經濟邊界上。大部分這些地區是低度發展的，正由於這個理由使得他們無法建立一個完善的經濟組織來推動地區朝向成長中心的模式發展，如同圖中全球資本的邊緣一樣。儘管這些地區經常藉由相關的財富和經濟機會來充實，而且其中的一些地區則很輕易地順沿著一個路徑讓自己的地區提升到更高的發展層次，如同在60-70年代發展興起的香港、新加城、臺灣和漢城區域，以及墨西哥中部便是這些都會區發展的例子，至於像曼谷、吉隆坡和聖保羅等地則緊隨其後，而尼日、象牙海岸、印度、印尼和越南則正要開始。所以，現正急切、但無法解決的政策問題是—如何點燃這些地區的發展過程？然而這些地區仍然堅持著預防工業化和都市化帶來的社會動盪的問題。

很清楚的，從Scott的二個主要的論點可知：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空間核心，主要是已發展國家的都市區域經濟所組成，而其他區域所指稱的則是開發中國家。Scott的確明白地描繪了在全球資本主義急速擴張的情況下，一個新的全球空間與都市區域間的連結。它不見得是一個階層高低的關係、也不見得是一個規模大小的問題，而是建構在生產和投資的網絡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來源：Scott, A.(1996：402)，本研究轉繪

圖4　現今全球資本主義的地理空間

中。因為資本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發展，即是經濟活動的分散化和管理活動的集中化。這使得生產的過程必需擴散到全球各個空間經濟中，而管理則集中在少數的區域中心，這也使得資本主義的全球經濟，可以組織在「都會區—腹地系統」的架構中，促成國族層級的經濟空間迅速浮現，形塑成全球經濟的「策略性空間(strategic space)」。這些核心都會區往往會彼此地接合起來，成為全球經濟最主要的發展引擎。它不僅匯集了許多企業總部執行著重要的決策功能，而且還藉由所謂的「企業服務綜合體(corporate service complexes)」—即金融、法律、會計和廣告廠商的網絡，以不斷創新的方式，進行跨國經濟與資訊的行銷管理功能。因此，在這些空間馬賽克化(mosaicizaion)的描繪中，區域經濟的專業化勢必成為當今全球經濟發展中成長最快速的一個關鍵。

這些所謂的策略性的空間，正符合了 Sassen (1994：14)所提出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假設，以及支持了藉由全球城市所形構的一個全球城市區域的理由—這包括了兩個以全球城市為基礎的都市內部聯結的型式：一是介於全球城市本身間的聯結；另一是介於全球城市與位在它的國家領域內的其他城市間的聯結。而這些型式的促成，使得東京、紐約和倫敦等全球城市在形成中觸發了當地工業的衰敗過程，與生產者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的興起，以及同時發生在這些全球城市所在國家—如日本、美國和英國中的都市系統的改變。

在從上述的二個研究範型中，大致瞭解了新的全球化經濟結構下都市區域的空間轉換情形，其中的許多假設與模式都表現了全球經濟整合的過程，以及區域的都市空間模式。這個藉由都市區域系統內的產業空間的重組和再結構，所建構的空間發展的新型式，很明顯的不同於前述對中國範型所執著的傳統地理的描述，同時呼應了中國所需要的一個以產業與城市為中心的新視野(如前一節所論述的)—亦正是與Desakota所帶來的傳統觀點不同之處。因此，之後在這些假設與前提下，本文將重新檢視中國改革開放後都市區域的發展模式，並且提出本文所要強調的一些新的論述與建議—產業的分工與空間聚集型式，其中包括一些先驗研究者對現今中國都市區域研究的新的視野，做為在對中國都市區域研究的回顧後一個簡單的回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中國新的都市區域的發生

如同Scott所重視的，透過生產和投資網絡所新形構的都市區域空間，強調著產業群聚的空間關係和持續不斷地創新過程，正是這個藉由全球化新的產業聚集與勞力分工所帶來新的空間型態，以及對於一個都市區域的空間實踐。因此，新的都市化將不再只重視在人口的改變和空間的仿拓，或是基礎產業的空間區位與交通的連結而已，如今反而更著重在新的產業發展在空間上，特別是都市區域，所帶來的影響。如同前述對Desakota的評論所建議的—企業、城市和個人應該被擺設在同樣重視的平台上，而不只是偏執於其中的一個元素，這是新的理論與範型的移轉給 Desakota所帶來的新思考，同樣也是Desakota所不足的部分。本研究這部分將強調這個產業空間發展的空間聚集—有別於傳統空間聚集的概念所著重在成本或是銷售單價的考量，而是放置在一個企業的全球策略和產業分工布局的制度上的一個回應，這於是說明了中國新的都市區域的發生，將為中國的都市區域帶新的發展模式。

實際上，透過全球聯結的都市區域效應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空間發展上形成了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以香港、上海和北京為中心的都市區域，它們與鄰近地區所形構的一個「都市連綿區」的新競爭區域—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正在全球的分工體系中逐漸地形構（參看表2）。特別的是，從表4的資料來看，這些地區擁有全國將近14%的人口數，卻佔有全國將近40%的生產總值，說明了以香港、上海和北京為首的這些城市-區域地區，在中國經濟發展上的絕對優勢，也說明了這些中國的「區域國家」在區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這代表著在全球競爭的潮流下：(1) 中國新的成長空間的形成和 (2) 三個主宰性的全球城市—香港、上海和北京在這些區域內的重要性更為增加—不僅是這個區域內生產、資訊、金融等服務活動的控制中心，更重要的是透過全球聯結和交流，成為區域內成長的引擎和擴散的揮發點。藉由這個生產結構的分配和運輸系統的連結，一個建構在廣大城市網絡基礎的「都市—區域」，未來將有別於昔日都市區域體系的概念逐漸地藉由擴散的效果在各個區域內形成。

建構在中國都市區域的這一套『都會區—腹地』系統，像是一個成長的引擎，未來也將像世界的幾個都會區，如波士頓—紐約—費城、洛杉磯—聖地牙哥—提瓦納、米蘭—圖林—熱那亞和東京—名古屋—大阪等一樣，將同時在全球和國家的發展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量。其中，每一個都市區域的核心都是經濟活動專業化的網絡基地，也整合了相當多且多樣性的地區性勞工，並且在這每一個系統中都是明顯的聚集經濟和收益逐漸增加的節點。更重要的，它們的每一個都包括了複雜的全球互動的結構，同時極化地帶動國家的發展與繁榮。

以珠江三角洲例，香港在這個城市-區域扮演了重要的功能—一方面香港是以珠江三角洲為基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另一方面香港成為珠江三角洲的生產控制與技術移轉的中心。由於區位的毗鄰、血緣和社會關係的連繫，珠江三角洲在吸收香港資金方面佔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1980年到1999年的20年間，珠江三角洲實際的實際利用利用外資累計達到808億美元，占廣東省全省的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 73%，以及全國的

表2　以上海、北京和香港為中心所正逐漸形構的都市區域

城市			地區總人口	地區非農業人口	國內生產總值
第一層級	第二層級	第三層級	（萬人）	（萬人）	（億元）
上海	南京，杭州	無錫，常州，蘇州，寧波，南通，揚州，泰州，鎮江，嘉興，紹興，舟山	7534 (6.83%)	3194 (6.83%)	16981 (16.34%)
北京	天津，唐山	廊坊，秦皇島	3386 (3.07%)	1657 (5.38%)	6412 (6.17%)
香港*	澳門*，廣州，深圳	珠海，佛山（順德），江門，惠州，肇慶，中山，東莞，清遠	3253 (2.95%)	1385 (4.50%)	8720 (8.39%)

說明：( ) 內數字表示2002年該項數字佔全國總量的百分比，總數未含香港和澳門部分。

資料來源：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2年。本研究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而實際在2000年的單一年度統計資料中，珠江三角洲實際利用外資達到125.41億元人民幣，竟高達廣東省全省的86.04%（廣東省統計年鑒，2001）。實際上，從表三所說明的，在這些外資的組成上，香港的投資佔了絕大多數的重要性，以1979年到2000年為例，香港對廣東省的實際投資占了78.13%，而2000年單一年度則占了74.48%的比例。這個高度吸收外資的重要面向，促使珠江三角洲急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區位之一，也成為國際性廠商投資與關注的區位焦點。這個藉由全球經濟勢力所提升的地區競爭力，如同大前研一所謂的「區域國家」，不僅在國家的發展佔有絕對的份量，同時也是中國所有經濟改革，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市場主義的一個試驗場所和領導基地，其中包括了金融、進出口、法律和不動產等專業服務業等的改革與發展而言。

建構在這個所謂「都會區—腹地」的空間特徵，投資成本上揚的香港和生產成本低廉的珠江三角洲結合起來，珠江三角洲成為香港投資者所偏好的區位，而香港則成為珠江三角洲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的窗口，這使得香港發展成為生產者服務業為主的地區，而珠江三角洲也成為香港主要服務的對象。在這20多年來的發展歷史，香港企業透過“三來一補”和“三資企業”的功能，大量地把勞動密集的中小型企業所依賴的生產工廠北移至珠江三角洲，這些企業包括紡織服裝、電子、玩具、金屬和塑膠製品等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幾乎占所有香港對珠江三角洲的投資企業的70%以上，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香港低成本加工的基地。另一方面，香港把生產過程中的市場開發、設計、採購、產品銷售和管理等前端和後端留在當地，從而形成「前店後廠」的區域分工空間結構（請參考前圖3）和由香港製造（made by Hong Kong）的國際品牌。

這個空間層級的投資關係說明了發生在這個區域的生產分工結構的變化，如同Desakota所忽略的，港商把香港製造或是在國際市場採購的半成品和原料“出口”到珠江三角洲，在當地所投資的企業加工完成後，再由香港廠商出口到世界各地。這一來大大地增加了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之間的轉口貿易，二來增加香港本地製造的半成品或原料對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因此，珠江三角洲的出口需要藉由香港的貿易公司所建立的市場通路，和利用香港在這個過程中所提供的其他支援性服務來運行，從而使得香港在這個生產銷售的過程中取得區位的優勢，另外，除了促使兩地的貿易增加以外，同時也間接地促使了香港對珠江三角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移轉。

這個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移轉的空間重要性包括了：首先，港商帶來了國際上流行的產品設計、生產設備、品質控制、產品包裝和市場行銷等知識，透過生產的垂直路徑大量地引進珠江三角洲，逐步地建立起生產的專業技術和技術研發的基礎，一方面增加珠江三角洲各地方與廠商接收外部技術的經驗，另一方面也縮小了香港和珠江三角洲間生產技術的落差；其次，透過港商的投資，在珠江三角洲的企業單元直接從港商學習了生產和市場銷售的技術，從而逐步地改善自己的技術，並且開始在國際市場中嶄露頭角，採購本身所需要的原料、半成品和生產自己的品牌。很明顯的，香港在這個移轉過程中的中介作用是重要的，一方面香港作為其他國家和地區對珠江三角洲投資的跳板，帶動了對珠江三角洲投資的項目，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技術移轉；另一方面，香港則代表珠江三角洲的企業單元進行國際市場採購時一個重要的媒介者的角色。除此之外，香港提供的管理技術同樣的在這個空間的形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透過大量管

表3　1995年以後香港資金投資於廣東省的比例分配

單位：億元美金

年度	簽訂合同數	占全部比例	實際利用港資	占全部比例	協議利用港資
1979-2000	65636	84014（78.13%）	718.77	988.18（72.74%）	1234.47
1995	6369	8177（77.89%）	79.73	101.80（78.32%）	181.56
1998	3804	4349（87.46%）	81.29	120.20（67.73%）	47.02
1999	2578	3071（83.94%）	73.39	122.03（61.01%）	31.47
2000	3572	4332（82.46%）	74.48	122.37（60.86%）	41.22

資料來源：廣東省統計年鑒，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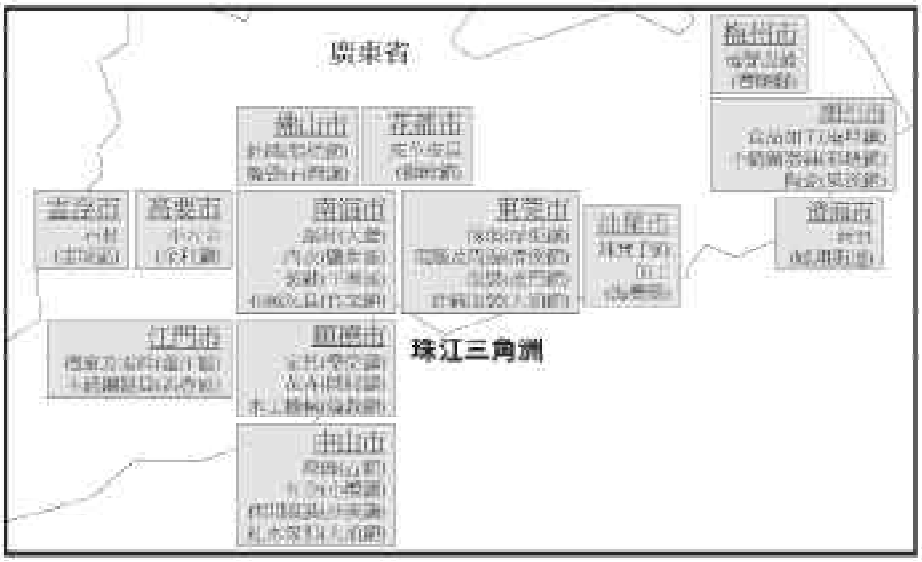
理人員的招聘與雇用，一方面負責許多投資中國的跨國公司在香港的業務，另一方面則直接涉入珠江三角洲當地空間單元的營運操作中。這使得珠江三角洲的企業更加速了與全球市場的連結，也同時縮小了與香港間的許多制度性的成本。

除了與全球關係鏈結的存在以外，在這些逐漸形成的都市區域中，透過了投資、生產與技術移轉的空間流動，區域中新的城市關係，像是網絡城市的建構一樣，則是在這個生產聚集的環境下形構了新的發展趨勢。專業生產單元藉由地方產業空間的聚集，產生了許多所謂的「地方產業群(local industrial cluster)」(王緝慈，2001，2002；朱華晟，王緝慈，2002；童昕、王緝慈，2003)，它在都市區域扮演著重要的城市分工角色，以及建構一套完整的生產空間體系(參考圖5)。

這個新的空間趨勢，透過大小企業彼此間細密的地方化(localization)分工組成，並且圍繞在某一產品的生產流程在進行，有時候是由大廠的空間移轉所帶動，即是所謂的「母雞帶小雞」的方式，有時則是產業間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聚集所形成，而扮演這個空間聚集的主要力量來自於企業，以及企業本身投資策略的選擇，而不再只有區位和個人的制度關係兩者而言。在這些逐漸發生在城市區域領域範圍中的產業聚集地區，如珠江三角洲的東莞和順德，以及長江三角洲的蘇州等地區(郭萬達、朱文暉，2003；朱文暉，2003)(請參看表4)，不僅代表著以最終產品相互關聯產業的構成，同時這個群聚效果也有助於培養新的技術和創新的能力，足以形成一個創新的系統(innovation system)和學習型的區域(learning region)(Morgan，1997；Florida，1995)。

東莞和順德是位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產業聚集的二個著名實例。前者是以“三來一補”為基礎所進行的外向型工業發展基地，後者則是藉由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所建立的品牌型產業發展中心。這兩個地區圍繞在以珠江三角洲為腹地的香港鄰近，二十年來伴隨著香港產業結構的調整，與香港產生密不可分的空間關係—如前店後廠，除了聚集著製造業大量的國外投資與生產活動以外，而且還是中國、甚至是世界，許多重要商品的生產基地。

其中，位在香港北方的東莞，目前已經聚集了以電子通信設備、電氣機械和器材、電力、塑膠製品、紡織和服裝等為主的產業製造群體，這些製造業不僅保持彼此垂直上下游的生產流程關係以外，同時還保持著水平間的產業合作關係。這個產業群落的發生，是與投資廠商的經營策略息息相關的，因為這些多數的廠商是以出口導向的生產模式為基礎，亟需建立與配套廠商之間高度合作的網絡關係，而這個極具彈性



註：圖中括號內文字係指當地生產的區位

資料來源：廣東省科技廳(2002)，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5　廣東省部分專業鎮及特色產業的分布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4　中國形成中的產業聚集地區

城市	區位	代表產業	聚集優勢	代表性的投資廠商	地區網絡的分工
東莞	珠江三角洲	電子通信設備，電氣機械和器材，電力，塑膠製品，紡織和服裝等	區位優勢(香港) 小政府和分權模式 三來一補 OEM 臺商	福地顯像管，新科電子，三星電機，裕元電子，光寶機械； 美國杜邦；瑞士雀巢；荷蘭飛利浦；德國赫司特，法國湯姆遜，韓國三星，日本日立，新力，住友金屬；英國太古集團；芬蘭諾基亞；香港偉易達等 (臺灣)臺達電子，源興科技，致伸實業，雅新實業和華容股份等	厚德鎮(製鞋業)，岭山鎮(家具業)，虎門鎮和石碣鎮(電線電纜)，長安鎮，清溪鎮和石碣鎮(電腦資訊產業)
順德	珠江三角洲	家電製造，電子產品，家具製造，通信電纜，木土機械，化工塗料	區位優勢(香港) 政府投資 鄉鎮企業 品牌和貼牌效應	科龍電器，美的，格蘭仕，櫻花； 日本東芝，三洋，松下；德國博士，克魯伯；加拿大北方電訊；美國惠爾浦，安普；韓國浦項；香港合和，新世界，　基兆業，蜆殼和震雄等	大良區(壓縮機)，北滘區(電機)，容桂鎮(五金零件)，勒流鎮(塑膠零件)，樂從鎮(泡沫包裝)，陳村鎮(印刷)，倫教鎮(橡膠和電控主件)，杏壇(清潔化工)
蘇州	長江三角洲	電子資訊，機電，新型家電，精密化工，石油化工，基礎材料，汽車和配件	蘇南模式 區位優勢(上海) 創新政府 臺商	佳能，愛普生，摩況羅拉，飛利浦電視，三星家電，諾基亞手機，阿爾法特手機，AMD晶片，富士通像機，日立半導體，安德魯電信，旭日科技，天弘科技； (臺灣)明基科技，華碩，南亞塑膠，鴻海電子，正新橡膠，統一食品，捷安特自行車，櫻花衛廚，耀寧電子等	蘇州工業園區(高科技)，蘇州新區(高新技術和製造業)，蘇州高新區(電子資訊，精密機械，化和新材料) 昆山(IT，精密儀器，精密化工和電子資訊)

資料來源：郭萬達、朱文暉 (2003)，本研究整理

的「買方主導 (buyer-driven)」所驅動的生產鍊關係 (Gereffi，1993；童昕、王緝慈，2003)，主要是為了反應客戶要求的一個調節模式，目的在於可以立即地滿足客戶的需要，或是反應市場的競爭。此外，且重要的是，東莞是近十年來臺商投資熱門的區位之一(註5)，臺商在這個城市的發展和產業連結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力量，因此臺商企業的進駐有利於東莞成為全球性製造基地的可能(註6)。以2001年統計資料為依據，東莞的生產總值佔全中國和廣東省的比例分別為0.45%和4.48%，而在進出口方面，東莞的出口占全中國和廣東省的比例則分別為7.11%和17.25%，進出口總額高達320億美元，名列中國所有城市的第三位。

在這個跨國投資的模式下，一方面，東莞最主要的功能便是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生產基地，而它所擁有的製造業的配套能力同時吸引了國內外的大型廠商投入設置加工廠和採購地點；另一方面，香港則扮演這些投資企業活動的財務控制的角色，主要為臺商的大陸公司提供轉運、接單、行銷、財務調度、收貨取款和融資服務(Yeung，2001)。香港並非臺商投資從事製造的地點，而臺商在香港當地從事產品銷售的活動亦不多。有了這個緊密的生產連繫，多數的臺商則將位於臺灣總公司的部分業務移往香港，方便進行香港接單、大陸出貨和香港收匯的步驟，同時透過香港進行原料和零附件的採購則成為越多越來的趨勢。加上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港對金融環境的開放，許多在大陸擁有大量投資的臺商都可以借助香港所提供的有利條件，有效地保持資金流通的彈性，既迴避了大陸債務拖欠和三角債務的風險，也脫離了臺灣政府的監督。因此，大多數的臺商選擇在香港進行金融交易，而在大陸進行實物的交割，大大地避免了許多存在的不確定性因素。令人驚訝的，部分在香港進行的資金合作，甚至可以透過兩方法律的灰色地帶巧妙地與廣東各地的生產工廠結合起來。因此，隨著臺港投資企業經營策略的選擇，香港做為金融控制中心的角色愈來愈重要，而這個新形塑的空間模式，幾乎也成為所有珠三角洲投資企業或個人所偏好的結果。

除此之外，不同於東莞所發展的代工模式，以家電製品聞名全球的順德，則代表了另一個與香港密不可分的城市區域產業的連繫。目前，順德崛起了全中國最多的優秀家電企業，建立了全中國最大的電冰箱、冷氣機、微波爐、電鍋、電風扇、烘碗機、熱水氣等的生產基地，同時培養了許多中國新的知名品牌，如科龍電器、美的和格蘭仕等。特別對冷氣機的生產而言，中國現今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而順德的產量則占有全中國的1/4，另外，生產熱水器的廠家則占全中國的2/5，這都表現了順德在中國家電製品市場上的實力。依據2001年的統計資料中，順德家電業的產高達337.41億元人民幣，占全市同類型工業產值的45%；其中在億元以上的工業企業而言，家電企業的產值為229.06億元人民幣，占全市的48.7%；而在出口貿易的30.88億元美金中，家電業的貢獻則超過了一半以上（郭萬達、朱文暉，2003）。為此，順德之所以可以成為全國，甚至是全球，重要的家電製造基地，一方面與順德週邊城市眾多電子產品製造業的配套能力有關，它使得在順德的任何一家製造廠商可以很容易地在當地採購到所需要的原料和零附件，擴大了現今所擁有的模具製造能力；另一方面則是藉由當地產銷商合作的模式，使得產品擁有全中國龐大銷售的保證。然而，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完善的產銷網絡下，吸引了國際知名的大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投資與合作，朝向精密家電、光學機械、通信電子等的高新產業的領域發展（參考表4）。這些跨國企業，一方面在當地建構完整的生產體系，或是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則透過香港的金融功能，不論是透過上市集資，或是股份的移轉，或是設置企業總部，與全球經濟的市場接軌。

另外，不同於東莞和順德的影響範圍與生產空間關係，蘇州和上海所形構的都市區域則代表中國另一個新的成長引擎與區域中心。位於上海西鄰的蘇州，近年來在眾多的跨國企業的投資與安排下，成為中國國外投資接受最多的城市之一，這不僅使得蘇州迅速成為全中國名列前茅的外資接收城市，也為全球重要的生產基地。這個原先在八〇年代初以「蘇南模式」聞名的城市，便是以「鄉鎮企業」為工業化發展動力的創造基地，在經歷了九〇年代中期的產權制度改革之後，成功地移轉了地區的產業結構和鄉村的剩餘勞動力，促使了城市的急速發展和大量的國際性廠商投資，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投資佔了大多數，於是從以輕紡織等傳統產業為主的產業型態，在十年間快速地轉化為以高科技為支柱的產業主體。到了2001年，蘇州六大新興產業分別為—(1)電子資訊、(2)機電及零附件、(3)新型家電、(4)精密化工和石油化工、(5)新材料和基礎原材料和(6)汽車和零配件等，合計銷售收入為1184億元，占全市500萬資產以上企業產品銷售量的42.3%，其中電子資訊比前一年增長了 21%（郭萬達、朱文暉，2003）。

值得一提的，在所有的蘇州的行政轄區中，昆山則是近十年發展最耀眼的一座城市，它一方面緊鄰著上海，享受區位上的優勢，另一方面，如同 Marton和McGee（1996）所提到的—昆山政府所具備的制度彈性，不僅在近來成為國際資本投入密度高的地區以外，也是外商投資產出回報最高的地區之一。此外，重要的是，如同東莞一樣，它也是臺灣投資者所偏好的地區，也是另一個在中國臺商群聚的地區之一。產業聚落的形成，也如同東莞一樣，藉由協力廠商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完整地從臺灣移到昆山來。直到2001年，累計臺商投資的金額超過 25億美元，占全省（江蘇省）的1/4，全國的1/10（朱文暉，2003）。

特別是高科技產業，近幾年來蘇州和昆山幾乎接收了從臺灣遷移大陸的重要高科技廠商，如鴻海、仁寶、倫飛等，這正代表與區別了臺灣產業轉移至大陸的第二個歷史階段。在以九〇年代初期為基準的第一個階段中，以珠江三角洲各城市為號召的投資偏好，正好彌補了臺灣企業迴避成本上揚和技術移轉的缺口，因此大量地吸納了以紡織、鞋類、食品和自行車等為代表的傳統產業和電腦周邊設備的高科技產業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投資與空間布局，使得以香港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成為九〇年代初期的重要發展據點，也造就「中國製造」的深刻印象，而東莞的崛起便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而這個階段，則代表了臺灣資訊產業最高技術的半導體、液晶螢幕和筆記型電腦等的移轉，正式宣告蘇州接收了臺灣高科技產業的整套製程的開始，並且隨著這些主流企業的進駐(註7)，一方面意味臺商對華東投資的熱潮，同時吸引了臺灣更多的配套廠商的投入，形成現今在蘇州和上海間所形成的產業聚集帶，另一方面，更提升了蘇州在全球高科技產業市場的重要地位。然而，蘇州與全球經濟掛勾所建立的生產體系，所不同於東莞和順德之處，它不僅是一個都市區域空間布局上的考量，從蘇州各廠商，如摩托羅拉、明　電腦、華碩等，試圖建立研究發展中心的作法，來說明這個優勢產業的特徵與本土化的趨勢是很清楚的—這回應了一個「學習型」區域對這些高科技廠商的聚集而言是重要的，而不只是反映了一個生產空間的彈性與網絡，以及買方主導的生產模式，同時也反應了一個制度性成本的關鍵。

新的蘇州模式，除了表現了一個產業生產的布局以外，另外還強調了城市-區域內城市間的聯繫，這個重點強調了上海與蘇州間無可取代的合作分工機制。隨著九〇年代初上海的復起，並由國家定位為「全球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以後，蘇州便很積極地定位自己是中國最主要的製造業和加工業基地，以及科技研發的中心，並且很清楚地與上海區隔，避免盲目的競爭，反而試圖藉由上海的輻射力量，來凸顯出自己區位上的優勢，同時與上海形構一個城市間互補與分工的關係。這個錯位的策略，使得蘇州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利用上海的金融、貿易的服務體系，以及方便的公共設施，另一方面則以低廉的土地和勞力成本，吸引高科技廠商的投資。除此之外，兩者間的內在關係同時也是企業與政府所關心的重點之一，而上海的區位優勢無疑提供了許多跨國公司投資當地的服務平台—一方面對外建立了與跨國公司的聯繫，以及相關的配套措施，另一方面則為了符合內銷市場的需要，提供給企業更高的服務水準。於是，由企業為中心的策略引導，透過這個區位上合作的機制，幾乎架構了一個位於長江三角洲的產業走廊，甚至於是一個廣大的"上海-蘇州工業區"。這論點強調了在這個都市區域中，上海所扮演輻射與支?的重要角色，以及蘇州在這個空間機制上的重要功能；同樣地強調了，中國一個新的都市區域的範型，以及新的發展模式。

以上透過了這三個實際的案例的簡述，可以很清楚地明白一個中國新的空間範型的發生，以及影響中國新的都市化動力為何。所以，新的都市區域不只是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空間圖騰上展現了一絕對的優勢，在一個全球區域整合的趨勢之下，新的區域透過全球的經濟網絡關係將產生一個區域的合作競爭關係—有可能是來自全球新的勞力分工體系、也有可能來自於跨國公司的合作關係，這使得全球區域區分成許多重要的次區域和生產中心，而且呈現了一個成長的合作關係和區域間的競爭關係。這些關係除了對外擴寬了都會區和國際間的聯繫，同時對內強化了都會區內各城市間的關係連結—這是透過勞力人口的移動和分配以及資金的投資和流動來達成的。因此，未來的中國的都市區域在全球的經濟發展上將會扮演一個愈來愈重要的地位，而不再是一個以自我依賴為主的國家市場而已。

六、結論

全球化持續地影響全球空間的結構，不管是區域的、或是都市的，甚至是跨國界的次全球地區的，都不得不受到這個來自於新的自由主義趨勢的影響，這使得全球化成為新世紀中影響政治、經濟和社會，甚至是空間，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力量。透過擁有絕對經濟權力的跨國企業的投資與安排，全球的經濟活動於是逐漸地被功能性分配在不同的國家與空間中，加上資訊和交通等科技的創新與進步，構成全球經濟活動的網絡更為廣泛地擴充和強化，使得這些跨國的企業活動可以在利益原則上順利地進行，讓全球各地間的經濟來往和聯繫更為頻繁與容易。因此，在新的全球化的時代中，完全展現了一個有別於以往的空間關係與現象。同時，全球化的研究議題，不僅成為當今都市與區域等空間研究中的重要項目，也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研究的新的研究範疇(簡博秀，2001)。而這個新的研究項目和範疇，除了掀起了新的研究議程以外，還為原有傳統的研究議題提供了新的思維和反省—本文便是建立在這個思考邏輯上。

文中大量引證了先驗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一方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支持對原有主流議題的反省，另一方面則增闢了對都市區域研究的新視野。本研究一開始，便從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都市區域研究中佔有絕對重要地位的Desakota研究為範本，透過對這個理論的回顧與評析，來說明現今中國都市區域研究所著重的焦點與內容，以及近來的補充與延伸，其中包括了國際勞力分工和個人網絡的制度成本上。但重要的是，本文暗示了原有的研究範型—『Desakota』的都市化論述在新的論述上是有不足的，而且無法完全反映來自於全球化一個新的空間形塑力量，並且藉由一些先驗研究者的建議—認為現今中國新的都市化應不僅放置在城市的角度來看待，企業和個人兩者在新的空間形塑過程同樣也是重要的。因此，新的空間論述，將不同於過去只著重在初級產業的空間分布，或是都市系統的安排來呈現，而是重新藉由企業行為與廠商的投資來回應。

在這些現今對中國研究的文獻回顧之後，文中舉證了二個建立在全球經濟論述的都市區域模型—區域國家和都會區-腹地系統等兩個研究範型，來說明在全球化下新的都市區域的發展模式，以便於區別原有傳統中國的主流議題，同時支持一個以投資與產業的空間分布來說明都市區域的空間型式是重要的。從這些模式中發現：一者，在全球的架構下，生產製造的國際布局與都市階層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於是說—⑴在全球的生產製程中，高階的管理活動都聚集在世界幾個主要的全球城市中，⑵中階的管理活動和行政功能，則聚集在核心國家的大都會區中和某些邊陲國家的首要都市內，⑶高科技創新和研發活動則發生在核心國家，⑷例行性的製造生產活動則同時分散在核心國家的邊陲地區，與新興工業國家和其他邊陲國家的都會區域（Knox and Agnew，1994：225）。這些空間的形構，如同全球城市的假設（Sassen，1994）—由區域內首要的都市，與鄰近腹地內的城市與鄉村所建構的「區域國家」，透過了跨國公司的投資與空間的安排，在全球經濟的連結上，展現了一個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具有絕對影響的都市區域空間，它不僅在都市與區域的空間上發揮極為重要的影響力，同時也在全球跨國空間的連結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再者，在一個國家領域內的都市區域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成長動力，它的經濟表現透過與全球經濟階層的安排，與全球經濟的串連而成為國家內重要的成長極，在這個區域內的城市透過廠商的制度成本的條件而形成了以產業聚集為基礎的競爭優勢，可以實際地反應了一個全球生產所需的彈性價值，並且編列全球的勞力分工之下，甚至成為一個重要的創新研發中心。

空間新型式在現今中國的都市區域的空間上逐漸地展開—不同於改革開放前所呈現的一個都市連綿區而已。以香港、上海和北京為中心的都市區域，它們與鄰近地區所形構的一個新的競爭區域—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正在全球的分工體系中逐漸地形成中（簡博秀、周志龍，2002）。重要的是，在每一個都市區域的核心都是經濟活動專業化的網絡基地，也整合了相當多且多樣性的地區性勞工，並且在這每一個系統中都是明顯的聚集經濟和收益逐漸增加的節點。同樣地，它們的每一個都包括了複雜的全球互動的結構，同時極化地帶動國家的發展與繁榮。而在這些都市區域的發生中，都市與都市間的網絡關係，正表現在廠商的投資偏好和一個空間生產的流動上，這使得在城市區域網絡中的每個城市扮演著自己專業的角色，並且透過大小企業彼此間細密的地方化分工組成，並且圍繞在某一產品的生產流程在進行，這於是形成了許多所謂的地方產業群，來呼應一個全球地方化的空間治理的模式。本中最後舉例廣東東莞、順德和江蘇蘇州三個例子來說明一個新的地方聚集現象，這是Desakota所未涉及的，卻是中國近年來都市區域發展上的一個重要的面向。這個論述，除了強調對對古典理論的一個再思考以外，並且建議了中國一個新的都市區域的發生。

註釋

註 1：Kwok（1988）認為78年以後的中國政府對生產的模式有了改變－它鼓勵私人的創業和投資來創造非生產性的資本，而這個改變的基礎在於經濟成長的任務取代了法令上的意識型態，成為了發展的目標。他以上海在改革後的發展為例，分別從幾個發展的指標－工業生產、工作機會、教育、服務業、社會公共服務、醫療和消費等方面來說明，都證實上海都會區在同一個區域、甚至是全國都佔有相當的比例和重要性。Kim（1991）則強調了中國都會區和其鄰近地區的連結在中國和區域經濟發展上的重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他透過都市經濟和工作機會、都市的經濟結構轉變、人口的成長與移動、以及都市公共建設和投資等面向來說明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都會區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集體企業和服務部門在都市經濟中愈來愈重要，這於是成為都市經濟變遷最明顯的部分，同時這個變遷也暗示了都市區域未來幾年的持續成長動力。

註 2： 崔功豪和馬潤潮（1999），Ma 和Fan（1994）等人以“ 自下而上 ”的都市化發展來形容以小城鎮為主的都市區域的發展模式，內容在於強調「農村地區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和勞動力轉化，以及建立農村城市（小城鎮）而呈現的集聚型城市化」，即鄉村城市化的過程。這套吸引人的「中國式」都市化的特殊模式整合在以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為主的蘇南地區做為代表，形成了頗具地方制度特色的『蘇南模式』，相關研究內容請參考沈道齊（1993）、宋林飛（1996）、吳大聲和居福田（1994）、張小林（1996）和劉傳江（1999）等。

註 3： 對於地方政府如何以彈性的手法來處理中央法令上的空隙，同樣的分析與實例可以參考邢幼田（1996）和Hsing, Y.T.（1996, 1998）等的文章和專書內容，其中有較為生動的描敘。

註 4： 就寧越敏（1998）的認為而言，不論是由上而下或是由下而上的都市化過程，或是外資、或是內部制度的因素考量，對中國都市化的描述都有不足的地方。首先，中央政府的影響力與城市的規模是有關的，也就是說大城市，特別是以工業發展為主的大城市，接受來自於國家的投資與建設遠大於量多面廣的小城市，所以由上而下的力量是比另一個要來得明顯許多；反觀在改革開放後中央政府投資力量下降以後，在有限資金的作用下，小城鎮不得不試圖尋找一個更合適的道路來開創自己的前途，因此激發了由下而上的一個特殊的發展模式。其次，雖然外資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就地理的分而言，主要的控制中心位布香港，大多數的企業與區內的城市並無直接的聯繫，因此導致了企業順延公路的蛛網型生產景觀。另一方面，強調內部制度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和渤海灣地區，卻是中國著名跨國公司投資最多的地區，主要的原因在於這兩個地區有眾多城市、潛力大的市場和完善的基礎建設，使得跨國公司可以利用良好的投資環境來建立以中心城市為基礎的銷售網絡。

註 5： 到2000年的六月底，在東莞的臺資企業已有3962家，占全市外商投資企業總數的 29%，實際利用（臺）資33.6億美元，占全市直接投資的28%；在這其中，東莞臺商企業總數占全中國10%，在廣東的部分則占1/3，因此，東莞成為臺商投資大陸最密集的地區。

註 6： 以資訊科技製造業為例，隨著九十年代臺灣電腦資訊相關產業相繼到東莞設立加工廠，已經逐漸地形成了以大廠為中心，其他大量專業化分工協力的配套廠商、關聯企業和下游企業網絡伴隨入駐的情勢發生。這個配套方式的空間流動，使得在東莞方圓50里以內已形成個人電腦生產將近95%的配套能力，並出現如長安、清溪和石碣等電子生產專業化的集鎮。

註 7： 在上海和蘇州等華東地區重要的臺灣電腦投資商，包括有在上海松江的廣達、昆山的仁寶、緯創、神達、志合和倫飛、吳江的華宇和大同、上海漕河涇的英業達等。這些群聚在長江三角洲下的高科技廠，甚至被形容是一個“ 電子巢 ”效應。

參考資料

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2 《廣東省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3 《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2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王緝慈

2003 〈我國製造業集群分布現狀及其發展特徵〉，《地域研究與開發》22 (6) ：29-33。

2002 〈關於東莞全球性製造業基地的思考〉，http://www.invest.gd.gov.cn。

2001 《創新的空間：企業集群與區域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宋林飛

1996 〈「蘇南模式」的社會機制與經濟機制〉蕭新煌和章英華主編《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105-124，臺北：臺灣社會學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郭萬達　朱文暉
2003 《中國製造—世界工廠正轉向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朱文暉
2003 《走向競合—珠三角與長三角經濟發展比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朱華晟　王緝慈
2002 〈論產業群內地方聯系的影響因素—以東莞電子訊息產業群為例〉《經濟地理》22 (4)：385-389。
沈道齊
1993 〈蘇南市鎮與區域的近期發展及前景展望〉楊汝萬主編《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展望廿一世紀》331-35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胡序威　周一星　顧朝林等
2000 《中國沿海城鎮密集地區空間聚集與擴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吳大聲　居福田
1994 〈蘇南模式〉周爾鎏和張雨林主編《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24-67，香港：牛津大學。
邢幼田
1996 〈臺商與中國大陸地方官僚聯盟：一個新的跨國投資模式〉《臺灣社會季刊》23：159-82。
姚士謀　朱英明　陳振光
2001 《中國城市群》(第二版) 安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
周一星
1986 〈關於明確我國城鎮概念和城鎮人口統計口徑的建議〉《城市規劃》3：10-15。
1991 〈中國的城市體系和區域傾斜戰略探討〉張秉忱、陳吉元和周一星編《中國城市化道路宏觀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周一星　曹廣忠
1999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中國城市化進程〉，發表於「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城市發展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廣東：中山大學， 12月24日。
崔功豪　杜國慶
1992 〈關于城市帶〉崔功豪等人編《中國城鎮發展研究》39-53，北京：新華書店。
崔功豪　馬潤潮
1999 〈中國自下而上城市化的發展及其機制〉《地理學報》54 (2)：106-13。
張小林
1996 〈蘇南鄉村城市化發展研究〉《經濟地理》16 (3)：21-26。
郭彥弘
1997 〈香港大都市規劃 :前店的規劃〉《地理研究》16 (2)：1-10。
許學強
1988 〈對外開放加速珠江三角洲城市發展〉《地理學報》42 (3)：201-02。
許學強　周春山
1994 〈論珠江三角洲大都會區的形成〉《都市問題》59：3-6。
童昕　王緝慈
〈全球商品鏈中的地方產業群—以東莞的“ 商圈 ”現象為例〉《地域研究與開發》22 (1)：36-39。
寧越敏
1998 〈新城市化進程—90年代中國城市化動力機制和特點探討〉許學強等編《中國鄉村—城市轉型與協調發展》201-07，北京：科學出版社。
薛鳳旋　楊春
1997 〈外資：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新動力—珠江三角洲個案研究〉《地理學報》52 (3)：193-206。
1998 〈珠江三角洲的“ 外向型城市化 ”〉許學強等編《中國鄉村—城市轉型與協調發展》281-93，北京：科學出版社。
廣東省科技廳
2002 《廣東省專業鎮技術創新》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
劉傳江
1999 《中國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與創新》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鄭天祥　戴錦輝
1999 〈以香港為核心的大珠三角都會區—第六個國際大都會區之展望〉楊汝萬、陸大道和沈建法編《邁向廿一世紀的中國—城鄉與區域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簡博秀
2001 〈全球化：中國都市的發展策略與未來〉《中國大陸研究》44 (12)：37-64。
簡博秀　周志龍
2002 〈全球化、全球城市與中國的都市發展策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7：141-94.
顧朝林等
1999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城市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
Alden, J.
1996 “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to local change for strategic responses ”,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 (4) : 553-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uglass, M.
1992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urbanization: planning for Bangkok mega-urban region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ing mega-urban regional in ASEAN countries: polic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As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angkok. 30 Nov.-3 Dec.
2000 "Mega-urban regions and world city formation: globalizatio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urban policy issues in Pacific Asia", Urban Studies. 37 (12) : 2315-35.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1) : 69-83.
1995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 P.N.Knox and P.J.Taylor. World Cities: in a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 Press.
Florida, R.
1995 Toward the learning region, Future. 27 (5) : 527-36.
Gereffi, G.
1993 "Global sourcing and regional divisions of labour in Pacific Rim", in What is in a Rim?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acific Region Idea, ed. A. Kirlik, San Francisco: Westview.
Ginsburg, N.
1991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Asia: a new spatial paradigm", in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27-46. ed. N. Ginsburg, B.Koppel and T.G.McGee,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Han, S.S. and S.T. Wong
1994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Reform and pre-Reform policies on urban growth in the 1980's", Urban Geography. 15 (6) : 537-64.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Held, D.
1991 "Democracy,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global system", Economy and Society. 20: 138-72.
Hsing, Y.
1996 "Blood, thicker than wa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Souther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8: 2241-261.
1998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Keil, R.
1994 "Global sprawl: urban form after Ford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12: 162-6.
Kim, J.
1988 "China's modernizations, reforms and mobile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2 (4) : 595-608.
Kim, W.B.
1991 "The role and structure of metropolises in China's urban economy",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 13 (2) : 155-77.
Knox, P. and J. Agnew
1994 The Geography of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Edward Arnold.
Kwok, R.Y.
1987 "Recent urban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own Planning Review. 58 (4) : 383-99.
1988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in China-a struggle between contradictions", Habitat International. 12 (4) : 195-207.
Laquian, A.
1996 "Rural-urban transition and the plan and governance of mega-urban regions in China", Asia Geographer. 15 (1,2) : 15-30.
Lin, G.C.S.
1999 "State policy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post-reform China, 1978-9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3 (4) : 670-96.
2001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al socialist economy: spatial structur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s", Urban Studies. 38 (3) : 383-406.
Ma, L.J.C. and M. Fan
1994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The growth of towns in Jiangsu, China", Urban Studies. 31 (10) : 1625-45.
Marton, A. M.
1993 〈區域經濟經濟發展和城鄉聯繫〉《城市問題》55：6-13.
1996 〈長江三角洲南部" 大城市圈振興 "理論的質疑〉《地理學報》51 (3) ：272-81。
1995 "Mega-urbaniz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enterprise location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local space", Chines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6 (1,2) : 9-42.
Marton, A. M. and T. G. McGee
1996 "Process of mega-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lower Yangzi Delta and Kunshan", Asia Geographer. 15 (1,2) : 49-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cGee, T.G.
1991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 expanding a hypothesis", In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3-25. ed. N.Ginsburg, B. Koppel and T.G.McGee,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1997 "Globisation, urbanis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ub-global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Asia-Pacific: New Geographies of the Pacific Rim, 29-45. ed. R.F.Watters and T.G.McGee,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Morgan, K.
1997 "The learning region: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 Regional Studies. 31 (5) : 491-503.
Naughton, B.
1995 "Cities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changing roles and conditions for autonomy", in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61-89. ed. D.S.Davis, R. Kraus, B.Naughton and E.J.Per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Ohmae, K. (大前研一)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看不見的新大陸—知識經濟的四大策略》(The Invisible Continent-for Strategic Imperatives of the New Economy) 2001；王德玲、蔣雪芬譯，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Sassen, S.
1994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CA,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Scott, A.
1996 "Regional moto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Future. 28 (5) : 391-411.
Shen, J.
2000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olicy", in China Review 2000. ed. C. Lau and J.Shen, Hong Kong: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Sit, V.F.S.
1996 "Mega-city,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Desakota, and exo-urb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Asia Geographer. 15 (1-2) :1-14.
Sit, V.F.S. and C. Yang
1997 "Foreign-investment-induced exo-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Urban Studies. 34 (4) : 647-77.
Soja, E.
1992 "Insides exopolis: scenes from Orange County", in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94-122. ed. M. Sorkin,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Tang, W. and H. Chung
2000 "Urban-rural transition in China: beyond the Desakota model", in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309-350. ed. S.Li and W.Ta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 Press
Thrift, N.
1994 "Globalization, reg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Urban Studies. 31 (3) :365-80.
Yan,Y., L.Jia, F.Li and F. Weng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etropolis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37-56. ed. J.R. Logan, Oxford: Blackwell.
Yeung, G.
2001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ase of Dongguan. New York: Palgrave.
Yeung, Y-M.
2000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Urban Challeng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Young, D. and H. Deng
1998 "Urbanizati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1952-91", Urban Studies. 35 (9) : 1439-55.
Zhou, Y.
1991 "The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China: a preliminary", In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89-112. ed. N. Ginsburg, B. Koppel and T.G.McGee,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2002 "The P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cities in China", In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59-73. ed. J.R.Logan, Oxford: Blackwell.
Zou, D.
1996 "The open door polic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 (4) : 525-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